

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白 描 苑 鹏

内容提要：社会关系是农民福利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民福利研究”课题组2012年在山东省、陕西省和河南省的农民调查数据，从正式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社会关系两个方面考察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在身处家里临时有急事、急需借钱、托人帮忙找工作、家里办红白事以及产生家庭纠纷需要化解这五种情境时，农民想到最多的是找与自己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人帮忙，其次是找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帮忙。进一步以农民的社会关系作为因变量建立有序Logit模型，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或人均消费支出越高，农民的社会关系越广泛；从事非农业的农民比从事农业的农民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患有长期慢性病的农民比未患有长期慢性病的农民拥有的社会关系更狭窄；而相比于家中没有病人的农民，家中有病人的农民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关键词：社会关系 农民 有序Logit模型

一、引言

所谓社会关系，泛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各种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关系（参见安东尼·吉登斯，2003）。根据社会关系规范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正式社会关系与非正式社会关系两大类。所谓正式社会关系，是指社会关系中受一定程序与原则制约、已经被制度化了的部分；而非正式社会关系则指社会关系中没有固定模式、不受原则制约且未被制度化的部分，例如亲戚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等。

现有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多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例如 Putnam（1993），Helliwell and Putnam（2005），Francesco（2009），曹卉、汪火根（2008），侯志阳（2010）。在社会学中，对社会关系的提法并不统一，有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等，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学者们对社会关系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例如，熊跃根（2005）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建构的策略问题，认为在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社会资本的积聚以及公民参与对培育市民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祝平燕（2010）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表明，个体拥有的社会关系越多，其社会行为越成功。而个体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从性别角度来看，男女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存在差异，男性在获取社会资本方面比女性有优势；而对于女性来说，亲属关系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政治社会资本。施建锋、马剑虹（2003）从社会支持的含义、分类、特性、测量、影响因素以及缓解压力的作用机制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他们认为，对社会支持的研究，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农民福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2M510698）的资助。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吴国宝研究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特此感谢。作者文责自负。

一方面,应该关注其作用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应该探讨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对社会支持加以有效利用。李林艳(2008)认为,虽然社会关系在市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参与市场运作时存在形式被过分看重的问题。由此,她主张将制度基础和文化环境纳入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唐有财、符平(2008)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任不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市场化扩大了人际信任的范围,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度。正因为社会信任在社会互动中产生,所以,人际交往越广泛,越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上述研究在识别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方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除了社会学的角度外,有的学者从福利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关系,例如王春光(2011)、彭开丽等(2009)、秦庆(2012)。在对农民社会关系的研究方面,笔者检索到的文献有:王晓毅(1990)从外在与内在的角度对农民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了梳理和剖析,认为传统的农民社会以血缘关系为主,家族是凝聚农民最强有力的制度;在解放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民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聚合受到冲击,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开始显现;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家庭的地位在社会关系中被重新确定,地缘关系的地位有所下降。许平(2007)的研究表明,在法国农业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传统的庇护性社会关系的解体,农民有了新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

从对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考察相对较少,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而现有文献关于社会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文以农民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利用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与计量模型,考察中国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探讨影响农民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农民福利研究”课题组2012年在山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开展的问卷调查。样本的选择过程是:首先,将全国各个县^①按照人均纯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将所有县分为高收入县、中收入县和低收入县三类。其次,从这三类县中分别选取两个县作为样本县。基于对调查时间的考虑,对样本县的选择以尽量在同一个省为原则,最终将样本县确定为山东省邹平县和胶州县,河南省西平县和伊川县,陕西省蒲城县和绥德县。然后,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分别在邹平县、胶州县、西平县和伊川县随机抽取10个村,分别在蒲城县和绥德县随机抽取6个村作为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村随机抽取10个农户,再从每户中随机选择1个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20份,收回有效问卷487份。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就业状况、收入与消费、住房条件、生活环境、时间利用、未成年人教育、健康与医疗、政治参与和社会关系、公共安全与生活保障等。在社会关系方面,调查问卷共设置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农民的正式社会关系与非正式社会关系。前者考察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老人协会、文艺队、兴趣组织、宗教组织、红白事理事会以及其它组织的情况;对后者的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内部关系和其它非正式社会关系。家庭内部关系主要以夫妻分开时的联系频率、与不住在一起的父母及子女之间的联系频率来反映。对于其它非正式社会关系,首先,根据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将其划分为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②;其次,设计家里临时有急事、急需借钱、托人帮忙找工作、家里办红白事以及产生

^①包括县级市。

^②血缘关系指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儿女;亲缘关系指家族里的长辈和其他亲戚;地缘关系包括邻居、同学朋友、村里

家庭纠纷需要化解这五种情境，考察农民在身处这五种情境时，想到的能够使用的社会关系（包括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

（二）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从受访者的基本特征看，受访者的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男性所占比重稍高（占 54.2%）；其平均年龄是 51.2 岁，年龄最长者为 84 岁，年龄最小者为 19 岁；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 年，有 4.3% 的人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受访者以已婚者居多，未婚者仅占 7.8%；受访者的社会身份以农民为主，村干部和离退休干部分别占 7.9% 和 7.0%。在健康状况方面，健康和有长期慢性病的人分别占 67.8% 和 20.8%，患有大病的人仅占 1%。在就业情况方面，从就业类型看，相比于从事非农业的人，从事农业的人所占比重高 27 个百分点；从就业地点看，6.5% 的人不就业或在家做家务，68.8% 的人在本乡镇以内就业，24.7% 的人在外地就业。总体而言，样本有一定代表性。

三、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描述

（一）农民家庭内部关系现状

从表 1 可以看出，2011 年，受访者夫妻间分开最长的一次以 1 个月以内为主，其次是 1 个月以上且 3 个月以内；而分开最长的一次达半年以上者所占比重仅为 7%。从 2011 年受访者夫妻实际分开的累计天数来看，也以一个月以内者居多，夫妻分开达半年以上者所占比重为 13%。可见，2011 年，受访者夫妻间分开的情况多属于短期分离。从上文对样本基本特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受访者多在本村以内就业，从逻辑上讲，这与受访者夫妻间分开时间以短期为主的结果相印证。当受访者夫妻分开时，至少每周与妻子（或丈夫）联系一次者所占比重最大，没事不联系者比每天都联系者所占比重高出 8 个百分点。可见，受访者在夫妻分开时联系频率相对较高。从调查结果来看，受访者夫妻在日常生活中联系普遍比较密切。从夫妻间的信任状况看，表示“夫妻间很信任”的受访者占 96%（n=464），表示“有些事情信任、有些事情不信任”者和“无法说清楚”者所占比重分别仅为 3% 和 1%，没有受访者表示“夫妻间并不信任”。当遇到事情时，8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夫妻间会相互商量”（n=465），表示“从不商量”者和“很少商量”者的比重分别仅为 4% 和 2%，另有 7% 的受访者表示“有些事情商量、有些事情不商量”。

表 1 有效样本夫妻间分开的情况

	有效样本夫妻间分开的情况		
	类别	人数（人）	比重（%）
一年中的累计天数（n=435）	[0, 30]	331	76
	(30, 90]	28	6
	(90, 180]	23	5
	(180, 365]	53	13
分开最长的一次（n=124）	[0, 30]	54	44
	(30, 90]	40	32
	(90, 180]	21	17
	(180, 365]	9	7

注：n 表示有效样本量；小括号表示不包括边界值，中括号表示包括边界值，下同。

从表 2 可以看出，受访者与不住在一起的父母之间以每月至少联系一次者和每周至少联系一次

的能人大户、村干部以及老家在村里但在城里当干部、办企业、做生意的人；业缘关系指同事、工友。

者居多，每天都联系者所占比重亦达到 25%。而受访者与不住在一起的子女之间以每周至少联系一次者居多，其次是每月至少联系一次者。受访者与不住在一起的父母或子女之间没事不联系者所占比重均最低。虽然受访者与不住在一起的子女之间的联系比与不住在一起的父母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但总体来看，受访者家庭内部关系普遍比较密切。

表 2 与不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现状

		每天都联系	每周至少联系一次	每月至少联系一次	没事不联系
夫妻分开时 (n=117)	人数 (人)	23	46	15	33
	比重 (%)	20	39	13	28
与不住在一起的父母之间 (n=219)	人数 (人)	54	72	76	17
	比重 (%)	25	33	35	7
与不住在一起的子女之间 (n=334)	人数 (人)	36	166	96	36
	比重 (%)	11	50	29	10

(二) 农民其它非正式社会关系的现状

当家里临时有急事、急需借钱或家里办红白事时，60%以上的受访者首先想到找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帮忙。当托人帮忙找工作或产生家庭纠纷需要化解时，首先想到找与自己有地缘关系的人帮忙的受访者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想到找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帮忙的受访者。可见，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是他们获得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主要渠道。将受访者当家里临时有急事、急需借钱、托人帮忙找工作、家里办红白事、产生家庭纠纷需要化解时首先、其次以及再次想到的人加总之后得到的结果显示，当家里临时有急事时，多数受访者会想到找与自己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人帮忙；当急需借钱时，想到找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帮忙的受访者所占比重最大；当托人帮忙找工作或产生家庭纠纷需要化解时，50%以上的受访者会想到找与自己有地缘关系的人帮忙；而在家里办红白事时，想到找与自己有亲缘关系、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人帮忙的受访者所占比重差异不大。此外，调查发现，农民很少想到可以从与自己有业缘关系的人那里获得社会支持。可见，农民非正式社会关系仍然以传统的社会关系形式存在，即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

表 3 农民其它非正式社会关系的现状

		亲缘关系	血缘关系	地缘关系	业缘关系	
家里临时有急事时	首先想到的人 (n=460)	人数 (人)	57	292	111	0
		比重 (%)	12	64	24	0
急用借钱时	首先、其次、再次想到的人之和 (n=984)	人数 (人)	212	380	385	7
		比重 (%)	21	39	39	1
托人帮忙找工作时	首先想到的人 (n=164)	人数 (人)	20	42	88	14
		比重 (%)	12	26	53	9
	首先、其次、再次想到的人之和 (n=300)	人数 (人)	56	63	152	29
		比重 (%)	19	21	50	10

(续表 3)

产生家庭纠纷需要化解时	首先想到的人 (n=157)	人数 (人)	35	50	72	0
		比重 (%)	22	32	46	0
	首先、其次、再次想到的人之和 (n=277)	人数 (人)	77	76	123	1
		比重 (%)	28	27	45	0
家里办红白事时	首先想到的人 (n=387)	人数 (人)	114	192	81	0
		比重 (%)	29	50	21	0
	首先、其次、再次想到的人之和 (n=981)	人数 (人)	341	298	340	2
		比重 (%)	35	30	35	0

(三) 农民正式社会关系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 农民对正式社会组织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 主要表现为绝大部分农民不能确定其所生活的村里是否存在正式社会组织。事实上, 许多村也根本没有建立正式社会组织。因此, 调查在这个方面所获得的有效样本量偏小。

具体而言, 从农民对正式社会组织的认知情况看, 知道所生活的村里有文艺队或宗教组织的农民所占比重最大, 知道所生活的村里有红白事理事会者和有老人协会者次之。在 487 个有效样本中, 仅有 36 个人知道所生活的村里有农民合作组织, 也就是说, 样本村农民对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相对较低。从农民参与正式社会组织的情况来看, 在所生活的村里有各类正式社会组织的受访者中, 本人或家人参与了红白事理事会的人所占比重最高, 本人或家人参与了宗教组织的人所占比重次之。调查结果表明, 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受访者所占比重比参与其余各类正式社会组织的比重都低。

表 4 农民参与正式社会组织的现状

	知道村里有该组织的人数 (人)	本人或家人参与该组织	
		人数 (人)	比重 (%)
农民合作组织	36	4	11
老人协会	98	14	14
文艺队	276	73	26
兴趣组织 (例如书法协会)	63	15	24
宗教组织	262	95	36
红白事理事会	112	83	74
其它组织	20	5	25

四、农民社会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变量选取与自变量的预期影响

1. 变量的选取及含义。由于此次调查所获得的参与正式社会组织的样本量偏小, 且受访者参与正式社会组织的程度较低, 所以, 本文选择从非正式社会关系入手, 分析影响农民非正式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诚如西方谚语所言: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与受访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相比, 当身处前文所设定的五种情境时, 他们实际想到的、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能够更直接地体现其社会关系的真实水平, 所以, 本文所选择的因变量 (*SOCIALN*) 是当家里临时有急事时、急需借钱时、托人帮忙找工作时、家里办红白事时和产生家庭纠纷需要化解时受访者想到的

能够使用的社会关系（因变量的具体赋值方式见表5）。每个受访者都分别给出当身处上述五种情境时他首先想到的能够使用的社会关系；而且当身处这其中的每一种情境时，他首先想到的能够使用的社会关系可能并不相同。例如，某受访者身处上述五种情境时，他首先想到的能够使用的社会关系依次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即符合表5中“想到全部社会关系，包括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情况，所以，该受访者社会关系因变量的赋值为15。

表 5 因变量赋值说明

条件	赋值	占比 (%)	条件	赋值	占比 (%)
仅想到血缘关系	1	3.1	同时想到亲缘和业缘关系	9	0.0
仅想到亲缘关系	2	0.8	同时想到地缘和业缘关系	10	0.2
仅想到地缘关系	3	2.1	同时想到血缘、亲缘、地缘关系	11	59.0
仅想到业缘关系	4	0.0	同时想到血缘、亲缘、业缘关系	12	0.2
同时想到血缘和亲缘关系	5	6.7	同时想到血缘、地缘、业缘关系	13	0.8
同时想到血缘和地缘关系	6	11.3	同时想到亲缘、地缘、业缘关系	14	0.4
同时想到血缘和业缘关系	7	0.2	想到全部社会关系，包括血缘、亲缘、	15	5.8
同时想到亲缘和地缘关系	8	9.4	地缘和业缘关系		

社会关系的主体是人，而人的行为会受其个人特征、性格和心理的影响。个人特征包括基本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就业情况等。在性格和心理方面，考虑到实证分析的可操作性和调查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是否常有满足感”和“是否常有消极感”两个变量来反映个体的性格，选择“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来衡量个体的心理因素。自变量的选择逻辑与具体内容见图 1，各自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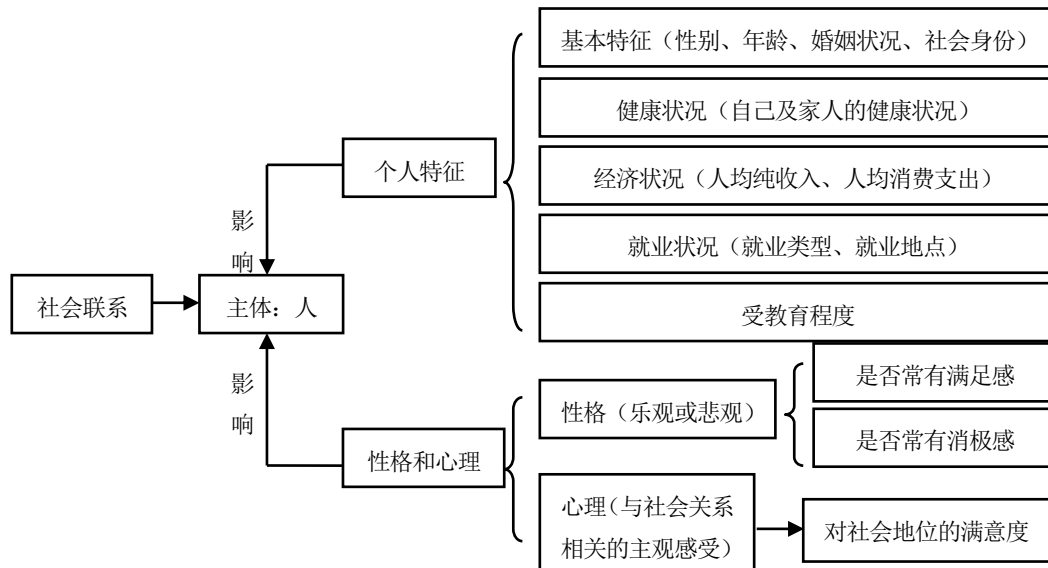


图 1 主要自变量的选择

表 6 自变量的含义

名称	代码	含义
性别	<i>GENDER</i>	男=0, 女=1
年龄	<i>AGE</i>	受访者的实际年龄(岁)
是否是村组干部	<i>STATUSC</i>	否=0, 是=1
是否是村民代表	<i>STATUSS</i>	否=0, 是=1
人均纯收入	<i>INCOME</i>	2011 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人均消费支出	<i>EXPE</i>	2011 年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元)
是否患有大病	<i>HEALTHB</i>	否=0, 是=1
是否患有长期慢性病	<i>HEALTHC</i>	否=0, 是=1
家中是否有病人	<i>SICKED</i>	否=0, 是=1
受教育年限	<i>EDU</i>	单位: 年
婚姻状况	<i>MARRIAGE</i>	未婚或其它=0, 已婚=1
夫妻间分开天数	<i>DAYDEPART</i>	2011 年累计分开天数(天)
是否常有满足感	<i>SATISFIED</i>	否=0, 是=1
是否常有消极感	<i>NEGATIVE</i>	否=0, 是=1
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	<i>SATPOL</i>	由受访者直接打分, 最低 0 分, 最高 10 分
是否就业	<i>EMPL</i>	在家做家务或不就业=0, 其它=1。
是否从事非农业	<i>EMPLNOR</i>	否=0, 是=1
就业地点	<i>EMPLACE</i>	在本乡镇以内=0, 在本乡镇以外=1
人均耕地面积	<i>FARMAREA</i>	2011 年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人)

2. 自变量的预期影响。(1) 个人特征的影响。从逻辑上讲, 性别对农民的社会关系并无影响。通常年轻人比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意愿更大, 机会更多, 所以, 随着年龄增长, 农民的社会关系可能变窄。当然, 也不排除老年人多年生活在一个地方, 从而拥有更广的人脉的情况。因此, 年龄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亦不确定。一般而言, 农民在村里的社会地位越高, 个人成就感越强, 且拥有的社会关系可能越广泛。按照常理, 已婚者拥有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可能比未婚者更多, 从而其社会关系可能更强。本人的健康状况和家人的健康状况都可能对农民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人患有长期慢性病或家里有人生病, 那么, 无论从心情上还是从时间上来看, 这个人都不太可能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参与社会交往, 其社会关系可能相对窄一些。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可能也越多, 从而其社会关系也可能越广泛。在就业方面, 有工作特别是在非农业就业的农民, 由于业缘关系更强一些, 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更多, 从而其社会关系可能更广泛。但是, 也不排除农民由于外出务工, 和家人、亲朋分开, 从而社会关系变窄的情况。因此, 就业类型、就业地点以及夫妻间分开天数对农民社会关系的影响并不确定。在经济状况方面, 一般来说, 收入或消费水平越高, 代表农民的生活水平越高, 其参与社会交往的能力可能越强, 从而社会关系可能越广泛。此外, 较高的收入或消费水平也有利于增强农民参与社会交往的信心。

(2) 性格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从逻辑上讲, 农民的性格越乐观(例如, 在生活中常有满足感、很少有消极感)或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越高, 其参与社会交往的意愿会越强, 社会关系可能越广泛。但是, 这也并非绝对, 毕竟性格与心理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且易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而产生差异。

(3) 其它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是农民,除上述因素以外,本文还考察了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民社会关系的影响。其原因是,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耕地是与农民关系最为密切的要素。预期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农民的社会关系越广泛。

(二)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对社会关系变量的赋值方式使得该变量的数值能直接反映受访者当身处家里临时有急事、急需借钱、托人帮忙找工作、家里办红白事以及产生家庭纠纷需要化解这五种情境时首先想到的、能够使用的社会关系的广度,即因变量存在排序问题。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而应该建立有序 Logit^①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利用 Eviews 软件对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所得结果见表 7。

1.个人特征对社会关系的影响。首先,在健康方面,从回归结果来看,患有长期慢性病对农民的社会关系有负向影响。由于患有长期慢性病,这类农民的社会关系比较窄,其社会关系仅限于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家中有人生病,那么,农民的社会关系反而更广泛,这与理论预期不符。究其原因,可能是当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顾时,农民希望靠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帮扶的机率可能更高,从而其社会关系在客观上被拓展。

其次,受教育程度对农民的社会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关系越广泛,这与实地调查的结果一致。调查结果显示,当家里临时有急事、急需借钱、托人帮忙找工作、家里办红白事、产生家庭纠纷需要化解时,仅想到血缘关系的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 年,而同时想到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的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4 年。

再次,在经济状况方面,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民的社会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提高消费水平,有利于农民拓展社会关系。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人均消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人均消费支出越高,即物质生活水平越高,农民的社会行为越能够获得更多物质层面的支持,从而有利于其拓展社会关系。而人均纯收入对农民社会关系的影响在模型中并不显著。

然后,在就业方面,相比于从事农业而言,从事非农业的农民,其社会关系变量落入高值区间的概率更大,即当其它条件不变时,从事非农业的农民的社会关系更加广泛。是否就业和就业地点对农民的社会关系影响不显著。如果从事非农业需要农民离开家乡去外地,那么,这部分农民可能因为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而减少原有的和家人、亲属、邻居之间的联系,即这部分农民的社会关系可能因此变窄。在此次调查中,大部分(68.8%)农民在村内就业,其同质性较强,因而,就业地点对农民的社会关系影响不显著。

此外,在基本特征方面,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性别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从实地调查情况来看,男性从事非农业的比重更高,因此,其业缘关系可能更强一些;女性一般留在家里种地和照顾老人、小孩,地缘关系可能更强一些。换言之,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性别对农民社会关系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年龄、社会身份和婚姻状况三个变量在模型估计结果中亦不显著。

2.性格与心理因素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心理方面,农民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越高,其社会关系越窄。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不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对社会地位感到满意,说明他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当身处上述五种情境时,他们只需要动用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的部分关系就可以解决问题,从而他们失去了拓展社会关系的动力。

^①根据有效样本残差分布的特征,在估计排序选择模型时采用了 Logit 的形式。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得到的系数所反映的是边际效应不同,有序 Logit 模型的回归系数所代表的含义是自变量变动所引起的因变量概率的增减。

在性格方面,是否常有满足感对农民的社会关系并无显著影响;而常有消极感的农民,其社会关系变量落入高值区间的概率更大。即与不常有消极感的农民相比,常有消极感的农民的社会关系更广泛。这与理论预期不符。其原因可能是,与城市居民“相邻不相识”的状况不同,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亲戚之间的联系普遍比较密切。当有心事时,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向亲朋好友倾诉。所以,常有消极感的农民拥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

表 7 农民社会关系影响因素的有序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i>GENDER</i>	-0.0226	<i>HEALTHB</i>	0.5179	<i>SATPOL</i>	-0.0435**
<i>AGE</i>	-0.0095	<i>SICKED</i>	0.3119*	<i>FARMAREA</i>	-0.0184
<i>STATUSC</i>	0.3008	<i>EDU</i>	0.0689*	<i>NEGATIVE</i>	0.1435*
<i>STATUSS</i>	0.1544	<i>EMPL</i>	0.1581	<i>SATISFIED</i>	0.0844
<i>INCOME</i>	0.0079	<i>EMPLNOR</i>	0.2540**	<i>DAYDEPART</i>	-0.0006
<i>EXPE</i>	0.0290**	<i>EMPLACE</i>	-0.0657		
<i>HEALTHC</i>	-0.3599*	<i>MARRIAGE</i>	0.1642		

注: *和**分别表示在 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本文基于山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 6 个县的农民调查数据,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考察了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作为因变量建立有序 Logit 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从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来看,首先,农民夫妻间的信任程度普遍较高。当遇到事情时,他们一般都会相互商量;当夫妻分开时,接近 50%的农民夫妻保持每周至少联系一次。其次,虽然农民与不住在一起的子女间的联系比与不住在一起的父母间的联系更加频繁,但总体而言,农民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均比较密切。这个结论有助于理解此次调查中的其它发现。在调查中笔者注意到,虽然农民的相对收入较低,但是,其主观福利水平普遍较高。其原因可能是,农民拥有比较和谐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所以,低收入状况对其主观福利的消极影响被削弱了。再次,当农民家里临时有急事时、急需借钱时、家里办红白事或者产生家庭矛盾需要化解时,54%以上的农民想到的、能够使用的社会关系是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当托人找工作时,50%以上的农民想到的、能够使用的社会关系是地缘关系。可见,农民非正式社会关系主要建立在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基础上;而现阶段,业缘关系尚非构成农民社会关系的主要部分。最后,农民参与正式社会组织的程度普遍不高,除红白事理事会之外,参与其它正式社会组织的农民所占比重均低于 40%。

第二,从影响农民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来看,在个人特征方面,就业类型、受教育程度、人均消费支出和健康状况对农民的社会关系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与不就业或从事农业的农民相比,从事非农业的农民的社会关系更加广泛;如果农民患有长期慢性病,那么,其社会关系将变窄;而当家里有人生病时,农民的社会关系反而更加广泛;受教育程度越高或人均消费支出越高,农民的社会关系越广泛。在性格和心理方面,常有消极感的农民,其社会关系更加广泛;而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越高,农民的社会关系反而越窄。性格与心理方面的研究结论与理论预期不符,虽然本文尝试对此做出了解释,但毕竟性格和心理因素作用于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且这些作用易随外界条件而改变,难以量化,所以,这也是后续研究中值得探讨的一个方面。

此外,前文的分析表明:农民参与正式的社会组织的情况并不理想。笔者在实地调查中亦发现,许多农民并不清楚自己所生活的村里到底有哪些正式的社会组织,更别提实际参与了。由此引出的两个思考是:第一,是否有必要在农村建立正式的社会组织?第二,由谁来建立?在很多发达国家,正式的社会组织早已成为农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笔者认为,在农村建立正式的社会组织,其意义和作用等同于在工厂设立工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家庭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让分散的农民依靠自觉意识联结起来成立正式的社会组织,除非有很强的经济利益驱动^①,否则难以实现。换言之,在农村建立正式的社会组织只能依靠政府。

参考文献

- (1) Putnam, R.: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00.
- (2) Helliwell, John F. and Putnam, Robert D.: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in Italy,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21, No. 3, 1995.
- (3) Sarracino, Francesco: *Soci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rends: Evidence from 11 European Countrie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2009.
- (4)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齐心、王兵、马戎、阎书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5) 曹卉、汪火根:《浅析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关系重构中的作用》,《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 (6) 侯志阳:《社会资本与农民的生活质量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 (7) 熊跃根:《论当代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资本建构与市民社会发展》,《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 (8) 祝平燕:《社会关系网络与政治社会资本的获得——论妇女参政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 (9) 施建锋、马剑虹:《社会支持研究有关问题探讨》,《人类工效学》2003年第1期。
- (10) 李林艳:《市场中的社会关系:理论化困境与出路》,《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 (11) 唐有财、符平:《转型期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因素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 (12) 王春光:《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福利问题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8期。
- (13) 彭开丽、张鹏、张安录:《农地城市流转中不同权利主体的福利均衡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2期。
- (14) 秦庆:《社会发展途径下失地农民的社会福利问题探讨》,《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 (15) 王晓毅:《聚合、集合与整合——农民社会分析》,《农村经济与社会》1990年第4期。
- (16) 许平:《法国农村庇护性社会关系解体过程分析》,《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责任编辑:霜 晴)

^①此处绝非指农民唯利是图,而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

